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三四期 ——
(二〇一〇年一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001b)

【书刊评论】	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陆小宝
【研究动态】	《倒下的英才》作者序	唐金鹤
【史实辨析】	科学馆的十天——我被 4 1 4 囚禁的日子 ——兼读唐金鹤《倒下的英才》有感	陈育延
【人物传奇】	杨宪益传 (节选二)	雷音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书刊评论】

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 陆小宝 •

清华校友唐金鹤同学花了数年的功夫，用血泪写下了《倒下的英才》一书，她要我写一篇读后感。这篇读后感我写得很艰难、很痛苦，几度彻夜失眠，几番停笔掩泣。因为这本书写的清华百日武斗，是我们这几届清华学生心中永远的伤痛。

清华百日武斗是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说它重大，原因有三条：第一，它作为文革中的武斗典型，曾经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在武斗规模上，它算不上是最大的，但是在首都北京，全国最高学府，历时三个月，死伤数百人，战况十分惨烈。尤其是 5 3 0 一仗，双方近千名现代大学生，身穿护甲，手持长矛，在东大操场摆开原始阵形，血淋淋地相互搏杀，实在是惊心动魄。第二，它是全国文革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清华武斗进行到 1 9 6 8 年 7 月 2 7 日这一天，数万首都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一事态使得全国文革从群众运动时期切换到工宣队时期，工人和军队占领了上层建筑，从而导致轰轰烈烈、历时两年多的文革群众运动的全面终结。第三，文革历史的研究中，不少专家对清华百日武斗产生了诸多疑问，比如，到底是什么动机驱使清华同学之间的拼死搏杀；最高学府的知识分子精英

为什么会如此丧失人性；中央最高层，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在清华武斗和727的事件中，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至今尚无人能够作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有关清华百日武斗的书籍已经有了几本。其中最早的，是著名美国作家韩丁1972年出版的《Hundred Day War》，译名为《百日武斗》，副题是“清华大学的文革”。“清华百日武斗”这一历史名词，大概就肇始于韩丁。2003年，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出版了《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一书，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04年，清华文革中四一四派头头沈如槐出版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其中第六章“百日武斗”，长达百页，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除了出版物之外，涉及清华武斗的其它媒体也不乏其例，如香港凤凰卫视就曾派出相当规模的记者阵容，在清华大学驻守了三个月，专门采访、编辑有关清华文革的电视节目，并早在海内外播出。

继这些文学家、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文革头头之后，现在，2009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唐金鹤又写成了《倒下的英才》一书。这个唐金鹤究系何人？她有什么资格来写清华武斗？她写的书又有着什么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呢？

本书中，第二部第一节的标题为“我算老几”。在清华文革中，唐金鹤只是一个普通群众，对写清华武斗这样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看来连她自己都有点发怯。更有甚者，本书中唐金鹤不经意地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她竟将当时几乎每个小学生都能倒背如流的毛泽东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硬是读成了“当年鏖战急”。看来，唐金鹤这个清华大学工科专业的优等生，她的文学素养和政治敏感度，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但是，超乎寻常的是，唐金鹤的书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几年前，《倒下的英才》曾在互联网“美国在线”上刊载，吸引和感动了一大片知识分子网民，大家争相传寄，在某些读者圈中竟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我本人就是在朋友的推荐下，在网上最初读了《倒下的英才》，然后又将它介绍给了几位清华同学。毕业后，我同唐金鹤四十年未通消息，主要也由于这个原因，互相找到并恢复了联系。

现在出版的这本书，作者在网上版《倒下的英才》的基础上，花了三年多的功夫，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补充，使得内容更加丰满，证据更加充实，叙述也更加真切。我一遍一遍地阅读书稿，几乎每次读的时候，都有一种撕心裂肺的临在感觉。而读后，我又几乎每次都陷入了无尽沉痛的历史思考。在我这个清华武斗的直接见证人看来，唐金鹤的书有着特殊的文字震撼力，也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唐金鹤不是文学家，但她是工程师。她以一个工程师的方式，复原了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唐金鹤不是历史学家，但她是亲历者。她以一个亲历者的感受，复原了清华武斗人员的历史形象。唐金鹤不是政论家，但她是有四个孙儿的老祖母。她以一个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了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复原了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

◇ 以工程师的方式复原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

目前中国大陆出版的历史类读物，戏说的成份过于浓重，大多已经与原本意义上的历史不相搭界。即便是较为认真的历史出版物，往往也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摆脱不了报告文学的套路，文艺腔太重，以文学描写的方式来叙述历史事实。这种半真半假的历史著作，无法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无法取信于后人，更无助于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沉痛的历史教训。不客气地说，我看到的回忆清华文革的文章，不少是趋时之作，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当时的历史情

境。

唐金鹤不是文学家，她是一位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工程师。工程师的工作方式，事事都有可靠事实根据，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臆造发挥。这种工程师的素养，唐金鹤在写作《倒下的英才》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倒下的英才》有两个部分，上部叫“清华园文革记事”，下部叫“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两个部分都是写清华武斗的，只是上部以搜集和记录武斗亲历者的回忆为主，下部以她本人的亲身经历为主。严格说起来，这两个部分都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

工程师办事的特点是：有所不言，言必由实。在本书中，作者不勉强地去概述百日武斗的全过程，而是把着重点放在530大战，以及团、四两派武斗伤亡牺牲者的具体情境中。凡是她所记的内容，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调查核实。据我所知，为了写作本书，作者几次从美国专程飞回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地，对当事人进行采访调查，并将书中所记的事发地点一一寻踪确定，实地拍下照片。另外，她还打了无数次长达几个钟头的越洋电话。本书采访的主要叙述者之一郑楚鸿，是唐金鹤的丈夫，香港工程师协会的会员（MHKIE），注册的机械工程师（R. P. E）。他是清华同学中公认的实诚之人。他虽然不写日记，但是几十年来对自己的每天所为都有记录。他在本书中所追述的武斗场景，开始觉得好玩，战斗中的紧张害怕，在受伤和面临生命威胁之时，却默默地去尽自己觉得该尽的责任，一一道来，真是十分的真实可信，十分的令人感动。

唐金鹤所调查的其他清华同学，大都具有同样务实的工作作风。为了核实某一个细微情节，比如，被枪杀时钱萍华穿的是黑裙子还是花裙子，他们曾经认真地争论了好久。为了确定530武斗中土坦克出现的时间，他们精确地查到1968年5月30日北京地区的日出时间是4点49分。为了指明武斗地点和方位，他们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出逼真直观的立面地图。这些，都是工程师方式写历史的优势。我记得，有位文革专家读了唐少杰所写《一叶知秋》后，在评论文章中，就曾为作者没有提供清华武斗地图而感到遗憾。

本书对搜集到的史料，经过认真筛选。不肯道听途说，也不肯媚俗随众。在追查卞雨林中箭死亡的原因时，唐金鹤曾专门向我调查：有人告诉她，卞雨林所中的箭上涂有氰化钾，是我们班团派同学郑××带到现场的。她问我知不知道此事。我给她回信说，我过去从没有听说郑××有过此举。在本书中，唐金鹤就舍弃了这个说法。相反，她在追查许恭生之死时说到，在两军对阵中，一位四一四的“勇者”出阵向许恭生单兵挑战。这一情节有点类似小说中古代武士叫阵，太戏剧化，真实性叫人怀疑。部分团派同学对此提出激烈批评，有些参战的四一四同学也不认同，我就是反对者中的一人。但唐金鹤认为，有二十多目击者肯定这一情节，应是事实。在本书中，她坚持采用了这一说法，并将它列为许恭生身亡的原因之一。

或许有人会说，核查落实这些细微琐碎的事实，对研究历史，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认为，任何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由细节组成的。凡是事实，都有核查的价值。任何事情，只要说的是事实，就会寓有历史的意义。举个小例子，本书记述530在北大操场双方长矛对阵拼杀的场景时，说到的“冲击波”，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却又不解其义的所谓“战了若干个回合，不分胜负”中的“回合”，这是冷兵器时代自然形成的特定战斗景象。这种实地记录，你说它是细节，其实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战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此机会弄懂这种细节，对加深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应该说不无价值。

而且，只有研究具体的事实，才能为历史科学构建坚实的基础，也才能为历史评判提供客观的依据。就拿研究530大战这段历史来说吧，四十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事件许多问题的看法，团、四两方各执己见，至今没能统一。但是，如果抛开政治观点和感情的纠

葛，专门追寻历史发生过的事实，那么，由于它的真相只有一个，两派同学说话也就有了共同的基础。在本书中，作者将团派武斗指挥官李自茂的文章，与四派几位武斗指挥官的回忆文字，放到了一起来进行考察，互相补充印证，使得两方指挥官的回忆能够丝丝入扣，拼接出530大战的历史现场真实面貌：这次行动谁是肇起者，谁是策划者；谁在进攻，谁在防守；在什么情况下死了人，在什么情况下放了火。通过这些细节的落实，谁应该为这次武斗负责，谁应该为几位同学的生命负责等问题，也就不辩自明了。

我这里只是说，本书复原了清华武斗的历史现场，并没有说，它已经复原了这场武斗的全部真相。虽然作者的本意是要追查事实，但由于个人经历和调查范围的限制，以及记忆的失真等等原因，我们不敢说，她所追查得到的，就已经是事实的全貌了。举个例子，书中讲到530大战临结束前，四一四“围魏救赵”，蒋南峰曾带一彪人马去攻打一教。在我的记忆中，在蒋南峰之前，刘万章就曾经从东大操场的队伍中抽出一股，攻打过一教，转了一圈，很快又回到东大操场。可见，即使是四一四中间，要复原全貌，就很不容易。何况，团派同学中像李自茂这样追忆武斗场景的文章，还很少见到。所以，要真正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全貌，还需要更多亲历武斗的清华同学投入其中，并作出努力。

还有需要说明的是，唐金鹤运用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来追查事实，是她的职业习惯所使。但是，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它的功用是处理“事实”。一旦离开处理“事实”的领地，而进入处理“观点”的疆界，比如表达情感、进行政治评判等等地方，工程师的工作方式无法运用，他们的职业习惯也就无所适从。在这些地方，唐金鹤往往也会失去了她的冷静和客观。她那充沛的感情，容易冲动的性格，倔强的脾气，就会一一显露无遗。所以，有人也许会认为，唐金鹤在本书中抒发的感想、议论和评断，不少是带有派性和偏见的。毕竟，工程师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性的弱点。何况，经历了像清华武斗这样的血腥对峙的两方，要做到真正的冷静和客观，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 以亲历者的感受复原清华武斗人员的历史形象

说起文革造反派的形象，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文学演义，大抵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脸谱：凶残，愚昧。参加武斗的人员，那就更是一帮愚忠于毛泽东的亡命之徒了。这种脸谱化的归类，过于简单化，无法解释一批高智商知识分子精英成为造反派、参加武斗的历史事实，也无助于让后人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在探索前进方向的过程中，走过的种种曲折道路和经受过的种种牺牲和磨难。还原这一代人走过的复杂历程，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现在的历史学家不去做，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去做。

唐金鹤不是历史学家，她是一个亲历者。她在复原清华武斗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复原了我们这一代清华学生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有极其丑陋凶残的一面，也有极其悲壮侠义的一面。人性是恶的，人性也是善的。我们需要昭示于后人的是：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性会暴露出它的丑恶；在什么特定的环境中，人性又会展现出它的善良。

“清华园里血斑斑”，本书一开头就掀开历史幕布，展示了一桩桩骇人听闻、惨无人道、人对人进行残酷迫害的事实。其实，这还不仅仅是人对人进行迫害，确切地说，是学生对老师的迫害，是同学对同学的迫害。什么是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什么是恶魔？这就是恶魔。令人深思的是，这些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竟然发生在最高学府，行凶者竟是一些经过全国范围内千挑万选，才选拔出来的“英才”。本书的书名虽然叫做“倒下的英才”，其实它的更多篇幅写的是“杀人放火的英才”，和“丧失了人性的英才”。当然，真正参加打人整人、杀人放火的，只是不多的几个人，但是，这种现象在当时确是普遍可见的，而且在一段时间中，大多数人竟能够容忍这种恶魔行为的公然存在。所以，如果把当时多数的清华学生说成是“中了邪的英才”，

确实不能算是冤枉。

本书之所以起名为“倒下的英才”，是因为：作者最先决定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纪念在清华武斗中丧失了生命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作为一个清华武斗中四一四方的救护人员，唐金鹤比其他武斗人员更多、更直接地目睹和经受了鲜血淋淋的生、死、伤、残的惨烈场面。这种记忆，就像利刃刻划在心中，毕生不会忘记。把这份感受写出来，用以祭奠死者的亡灵，这是唐金鹤给自己设定的责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530大战中团派方面死亡的许恭生，又正好是她的同班同学。这使得她追思死亡同学的这份责任，压在心上更加沉重。

许恭生曾是全国高校击剑冠军，在武斗中被对方用长矛刺死，其人其事，影响很大，至今网上有不少文章还在说到他。不久前，我在“清华大学本科招生网”上看到一篇题为《最忆是清华》的文章，写的是作者儿时同韩丁的女儿卡玛结伴在清华园嬉戏的回忆。文中有一段提到了许恭生，读后让我伤感下泪。我特将其摘抄如下：

击剑我们也常玩，主要是受电影《三剑客》的影响。我们很快弄清剑分三种，轻剑、重剑、花式剑。其中轻剑只能刺，不能砍，重剑只能劈砍而不能刺；而花式剑则又能砍又能刺。我最佩服的是当年全国高校的重剑冠军许恭生。他的动作现在想起来，真的和佐罗差不多，既利索又美，而且一气呵成。文革开始后，他加入了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派”。“井冈山”和“四一四”派发生武斗时，许恭生总是担当主力前锋。当时的武斗，因为是冷兵器，所以我们常去观看。两军对垒，个个都身披飞机铝做的盔甲，手挺长矛。但你来我往，并没什么伤亡。

许恭生确实称得上英才，是当时花季少女心中的偶像。叫人感慨的是，作者笔下的清华武斗场面竟然是“因为是冷兵器，……你来我往，并没有什么伤亡。”她们也许不知道，她们青春时的偶像许恭生就是在“冷兵器”的交战中，被生生刺死的呀！她们也许也不知道，许恭生死后不久，清华武斗很快从“冷兵器”升级到“热兵器”，绝不是“并没有什么伤亡”，实际上，伤亡人数多到了几百人。文章作者当时不是清华学生，她们不了解清华武斗的详情，并不奇怪。奇怪而且令人吃惊的是，清华大学竟然将这篇文章放在本科生招生网上。呜乎，鲜血的教训是这么容易忘却的吗？历史的事实是这么容易湮没的吗？

许恭生是英才，在清华武斗中丧生的其它同学，也都是英才。他们的死，让活着的人扼腕痛心。对他们的死，我反对当时的人们将他们称之为烈士，也不同意现在的人们把他们说成愚昧的牺牲品。他们不是烈士，但是，他们也没有白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绝不是愚昧的人，他们相信了某种理想，为了自己的理想，在探求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过程中不幸身亡。无论他们所相信的理想是对是错，他们肯为自己的这种理想去作战，去面对死亡，他们的这种精神和行为，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没有，这样的精神不可或缺。我很愿意看到，现在的青年大学生从“中了邪的英才”中清醒过来。但是，我不希望看到，今后的大学生从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吸取反面教训，变得“精明”，变得犬儒，一个个都成了“范跑跑”那样的人物。

现在的人们看来，当时清华学生的集体行为确实是太过怪异。20世纪的大学生，身披盔甲，手执长矛，近千人排列开古典战争的阵容，相互搏杀。这不是唐·吉珂德吗？这不是比唐·吉珂德更加可笑吗？须知道，人类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可笑，而是觉得势之所迫，不得不为。到今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是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参加武斗人员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后悔当时自己的选择。他们可能会对自己处在那个时代环境而感到可悲，却不会对自己那时的行为感到可笑。

评价人们的行为，不能只看他们做了什么，还要看是在什么情势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据我所知，一些国外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往往习惯于要在意识的表象下找出实际的利益趋动力。清华百日武斗使他们感到困惑：清华武斗的参加者基本是一些学生，在这些同学之间能有什么实际利害，尖锐矛盾，值得他们以死相搏呢？流行的解释是，武斗的实际利益趋动力是部分造反派头头的个人权力欲望。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否则，这场武斗也打不起来。但是实际上，两派头头和广大群众之所以投入武斗，这并不是他们心中更深层的利害掂量。许多群众参加武斗，确实有着自身利益的趋动力，这就是为生存而斗争，为不当反革命而斗争。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中，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可不是说说而已！如果自己这一派真的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话，最后清算起来，许多人可能真的就成了反革命，至少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政治错误可犯不起啊，年纪轻轻，这一辈子可就惨了。清华文革的头头唐伟同学曾经说过：“我们是‘奉旨造反’，或者叫‘跪着造反’的人，经常想的决不是升官发财，而是不要成了五七年的右派，不要被打成反革命。而像沈如槐等四一四派同学，坚持武斗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害怕蒯大富上台后大搞像现在陈水扁一样的流氓政治和统治权术。”他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真相。

另一方面呢？这些外国研究者产生困惑的原因，部分可能也由于他们太重视实际功利，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对当时中国大学生所起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最显见的当然是毛泽东思想。据我所知，当时清华学生中真诚相信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愿意为这种理想而拼命的人，确实也还是有的。而除了这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思想的影响，常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

清华物理教研组有一位小王老师，由于种种原因，被陷在科学馆里面。他写过一篇文章，平实地记述了他在科学馆中所见所闻。他将留在科学馆里的几位女同学称为“侠女”。读者自己可以看出，本书作者唐金鹤同学在武斗中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侠女”。唐金鹤在本书中记叙的不少人和事，也都有这种侠、义之风。这“侠”和“义”两个字，是我们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文化革命中并没有消失。它超越“极左或者极右”、“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等等意识形态的纷争。在我们这个民族处于危急患难之时，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这种品性，势必会展现出来，来应对这种危难局势。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可能认为：留在学校参加武斗的人，一定都是那些团、四两派中派性观点最极端的铁杆分子。事实不是这样，至少就我所知道的四一四方，不是这样。事实是，四一四派内部还分成几派，其中原属天安门纵队的三七战团是它的鸽派。沈如槐的文革回忆录就认为，天安门纵队的领导人是较得人心的“谦谦君子”。他们是一些颇具资格的平民造反派，观点温和，很有文采和口才。他们中的孙怒涛、汲鹏和王良生是被蒯大富列入530革委会名单的，但孙怒涛和汲鹏不满蒯大富的极左做法，放弃官位，毅然同蒯大富决裂。本书有很多处提到汲鹏，他是四一四方武斗中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沈如槐在他的著作中曾指出：清华百日武斗中，四一四方武斗的中坚，特别是各系、各战区级的武斗指挥官，临危受命的，基本是三七战团的“谦谦君子”。像唐金鹤这样，连温和观点的天安门纵队都没有参加，那就是更加中间的温和派了。他们一向不想武斗，抵制武斗。但是，武斗战火烧起来后，他们留在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学校里。而唐金鹤，那是离开了以后，又回来的。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它说明，不能简单地将清华武斗全部看成是两派政治观点之争，它其中的一部分是道义之争。这一部分人参加武斗的主要思想趋动力，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是侠义、仁爱等等传统的中华道德文化。

当然，清华学生不是金庸笔下的侠客。他们是当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从唐金鹤搜集到的数据可以看到：清华武斗中出生入死、负伤流血的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后，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真才实学，大部分人做到事业有成，他们中有的是博士，有的是教授，还有人在科技领域作出了杰出的社会贡献。在文化革命中特定历史环境中，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精英，参加武斗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应当的选择。

从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出，文化革命中的这场武斗召唤出人类灵魂深处最丑恶的部分，也召唤出最高尚的部分。简直可以说，这是天使和魔鬼的共舞。但是，看了书中的事例，读者千万别以为四一四就是天使，团派都是魔鬼。事实绝非如此。其实，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凶恶和善良，每个派别组织中都有天使和魔鬼。目前有人已经写文章揭示，四一四派也有非法关押无辜群众的，也有虐待俘虏打人的。最近，团派头头陈继芳同学在谈到反思文革时说，妖魔化对方就是妖魔化自己。她说得不无道理。如果有人借反思文革的名义，有意捏造事实而妖魔化对方，那当然是绝对错误的。汲鹏曾给我说过这样的话：四一四和团派其实是一对双生兄弟，团派犯过所有错误，四一四几乎全都犯过。比如，团派关押了罗征启老师，四一四也关押了陶森老师，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受到的身体摧残和心灵的创伤，那都是一样的呀！对他们，现在在我们的心里都是深深的懊悔和内疚。

唐金鹤不是不想公正，只是囿于个人经历，她没有能够看到并写出事件的另外一面。我想，如果团派同学也写出一本回忆清华武斗的著作，他们中必定也会有不少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动人故事。我还认为，即便是那些在武斗中作出错误行为的同学，也绝不是天生的坏人。他们的一些残暴行动，乃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教唆、被诱导出来的。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本来也是十分优秀的人才。本书讲到在清华有过一个从活人口中拔牙的残暴事件，对此，汲鹏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个在活人口中拔牙的同学，事后受到公众的谴责，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牙科大夫”。汲鹏一次见到他，开玩笑地给他打招呼：“牙科大夫来了。”那知这位同学听到后，很诚恳又不无诙谐地调侃自己说：“我不做牙科大夫了，我现在改行学针灸了。”汲鹏后来了解到，这位同学确实业余学会了针灸，免费为不少人解除了病痛。就是蒯大富本人在武斗中，同样有着善良不忍之心。他在深圳同唐金鹤谈到谢晋澄之死时，我就坐在旁边。我看到他说起这段往事，声音哽咽，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谢晋澄刚死的武斗初期，蒯大富就能将这份善良不忍之心萌发扩大，以此心此理来处理武斗中的团、四两派的矛盾，那末，清华武斗的许多悲剧恐怕也是可以避免的了。

但是，我不想说，在清华武斗中团派和四一四派犯了同样程度的错误，你错我错大家错，没有什么差别。这种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早在工宣队时期，有关部门就已经查明：最先策划挑起武斗的，是团派一方；发动530大战的，是团派一方；几起恶性事故，将人活活毒打致死的，是团派一方；放火焚烧东区浴室和科学馆顶楼的，是团派一方；开枪打死同学的，是团派一方；七二七那天，打死打伤多名来校阻止武斗的工人群众的，还是团派一方。在文革中和文革后，受到法律惩处和政治处理的人数，团派方确实比四一四方要多得很多。这些早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这些不争的事实，却在文革研究专家中间引发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两个学生群众组织的行为差别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真的老四比较善良，恶人都跑到老团那里去了？

对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解释是组织成员决定论。有些研究人员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两派群众的家庭成分、党团员人数等等一一进行对比，试图从统计百分比中找出答案。他们甚至将某些武斗打死人的现象说成是坏人进行阶级报复。团派同学叶志江在他的《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一文中，谈到团派观点的教师群众组织“红教联”时，说“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在谈到武斗中开枪打死杨树立的赵德胜时，他说：“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而且他也相信了“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可见叶志江基本上是倾向于这一种解释的。还有一种解释是政治观点决定论。他们认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本性就是走极端、排除异己，是邪

恶的。团派受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蛊惑比四一四深，所以在文革中做的坏事也就比四一四更多。本书末尾，唐金鹤引用了四一四头头孙怒涛同学的一封信，他的论述大概就属这种解释。

应该说，这两种解释都有它们一定的道理。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团派在武斗中过失较多，其主要原因不在群众，而在头头。同学中分派站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两派群众的人品和能力，基本一样，至少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虽然总体上，团派的造反精神比四一四强，具体到个人，其实，大多数团派同学比四一四的同学更听话，更顺从，甚至更怕事。因为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支持蒯大富的。选择参加团派，这是跟形势，随大流；选择参加四一四，反倒需要一点反潮流精神，多少有点要与中央文革别着劲干的意思。团派头头在武斗中出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准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符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他们吃准了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他们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有恃无恐，头脑发胀，有点肆无忌惮，做事失去了基本的分寸。

沈如槐在看了毛泽东 7 2 8 召见的讲话后，在他的书中说：“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把蒯大富看成是自家的好孩子，犯了点错误，上帝原谅他们；而 4 1 4 则是一群异己分子。”其实呢，不如打个更形象的比喻：在毛主席眼中，蒯大富和四一四都是自己家的孩子，只是蒯大富是亲生的，四一四则是前娘生的，手掌手背的肉不一样疼，偏心肯定是有的。两个儿子都喊娘，争着表示自己最有孝心，其实谁得宠谁不得宠，他们各自心里早就体会得明镜似的。小哥俩一见面就吵，终于打起架来。当娘的喝令几次都息不下来，干脆放话不管你们了，任你们两个小孩子自己打去吧，看你们能闹到什么田地才罢手。两个孩子越打越厉害，娘在一边坐着，说是赌气不管，心里却是巴不得自己的亲生儿早点能够打赢。蒯大富动刀子出狠招，她半闭眼睛看不见。她的全副眼神盯着四一四，一旦四一四使出什么伤人的打法来，她就会立即变脸，对他实施最严厉的惩罚。这种态势，蒯大富清楚，四一四头头清楚，在旁边作势劝架的管家谢富治的心里也是清清楚楚。蒯大富有恃无恐，大开杀戒；四一四顾忌重重，缩手缩脚，当然就只能多吃些亏了。四一四头头不是没本事打，也不是生性善良不忍心打，实在是在偏心后娘的眼皮下，不敢放开手脚来打。这就叫“不得宠的孩子有眼色”。也幸亏他们有眼色，在这样疯狂险恶的环境下少犯了好些更严重的错误，正如四一四头头蒋南峰在本书中所说的：四一四能够全身而退，简直是一个奇迹。蒯大富呢，他错以为只要靠到一个娘，天底下杀人放火的事都可以干，竟然将家里特地请来拉架的叔叔伯伯都打死打伤一大片，这叫做“宠坏了的孩子惹大祸”。到了这种地步，已是天理不容，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护得住你、救得了你了。

上面我把毛泽东比作偏心的后娘，可能有点失敬。其实，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当然要爱护；对不符合他政治主张的群众组织，他也当然要反对。这是很正常的态度。对这一点，他是公开明示了的，并不隐瞒。在蒯大富闯下了大祸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说，他站在蒯大富一边，不喜欢那个四一四。这也应该说是一种光明磊落的风度。还有，尽管他很不喜欢四一四，至少在大面上，还是给了团、四两派一个平等的测验机会：没有把“制止武斗的工人队伍是他亲自派的”这个信息，单方面通知蒯大富。尽管测验的结果，十分的不如他的心愿，他一再遗憾地责怪蒯大富太蠢，为什么四一四不开枪，偏偏你蒯大富开了枪呢！这真是恨铁不成钢的一片护犊之心呢！现在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埋怨蒯大富在 7 2 7 的作为，坏了全国造反派的大事；还有人说，毛泽东没有把派队制止武斗的消息私下通知蒯大富，是故意诱使蒯大富犯错误，是有意要收拾造反派；还有一位团派同学竟然说，7 2 7 是毛泽东自导自演，演砸了锅的一场戏，等等。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些说法，对毛泽东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 以老祖母的价值观复原评论清华武斗的基准

对清华武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四十年来，中外学术界有好几种不同的评价。同是政治评论家，写《百日武斗》的韩丁和写《一叶知秋》的唐少杰，两个人的看法，就很不一样。这不仅因为写作年代不同，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究其内里，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标准也是很不一样的。在我们这些老百姓眼里，政治评论这一套东西实在太玄妙，同一件事，你说“好得很”，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他说“糟得很”，也可以写出大篇文章来。这里头，怎么没有一个统一的评论基准呢？

唐金鹤不是一个政治评论家。看她所写的文章，不少读者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是一个不怎么过问政治的人。唐金鹤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她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现在她有两个儿子，四个孙子，是一位典型的老祖母了。古今中外的老祖母，都有老祖母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她们对政治的看法往往是既幼稚，又固执，唠唠叨叨，却常常能把那些伟大政治家呛得一楞一楞的，实在拿她们没办法。她们的价值观说起来很简单：你们那些政治理论一套一套的俺们弄不明白，俺就是一句话，杀人放火的事肯定是错误的！

在美国，民间有个特别的反战组织，叫作“老祖母和平旅”（Granny Peace Brigade）。只有当上祖母的人，才能参加这个组织。一两年前，这些老太太反对小布什政府侵略伊拉克，活动十分活跃。她们或静坐、或示威，还编了许多反战歌曲，一路游行一路唱。更有绝的，她们集体占领征兵站，说是宁愿自己代替她们的孙子去当兵。小布什政府被弄得哭笑不得、恼羞成怒，还真下手抓过她们中的一两个人。这一下，更犯了众怒，连老布什的夫人都不干了，因为她也是老祖母。小布什没办法，只好赶紧放人。“老祖母和平旅”的政治主张，也是极其简单：那怕你小布什的侵略理论说破天去，反正打仗杀人的事情就是要不得！

唐金鹤对清华武斗的评判标准，同“老祖母和平旅”对伊拉克战争的评判标准，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性为本”的标准。这个标准，简明地说出了人类政治最原始的真理。正因为它原始，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用这种老祖母价值观，来复原我们对历史重大事件进行评论的基准，当然也应该用来复原对清华百日武斗，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论的基准。

老祖母的价值观，并不是真的只是老祖母才有的专有品。其实，在人民群众中间，无论男女老少，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为数甚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当年清华百日武斗的参加者，经过四十年的社会磨练，现在大多数人都基本认同了“人性为本”的标准。唐金鹤在书中引用了但桑同学的一段话：“人性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国家大政方针的根本。心地善良是做人的根本。社会要以人为本，人要以善为本。”他的话，说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今天我们回顾清华武斗，和反思文革的目的，就是力图尝试运用这种“人性为本”的基准，来重新认识和评价我们自己的这段历史。

我这里只是说，我们在“尝试”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对清华武斗和文化革命进行历史评论。我并没有说，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用这种基准来评论这段历史了。用“人性为本”基准来评论历史，看起来很简单，而且好像已经是大家的共识。其实远非如此，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这个问题上，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从来不用“人性为本”的基准，他们用的是另外一些基准。那是些什么基准呢？他们的基准各式各样，有的是意识形态，有的是政治集团的利益，还有的是本民族的经济利益。他们往往认为，一个历史事件，只要它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那么，做一些违反人性的举动，那就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应该肯定的。有些重大历史事件，杀了几万、几十万人，并不妨碍它们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正面评价。比如在中国，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一些人进行镇压和打击，一向被认为是正确的；在美国，为了推进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动战争，屠杀别国人民，许多政治家认为也是应该的。为了同“人性为本”的

历史评价基准相区别，我暂且将他们这些各不相同的基准，起个简化了的名词，叫做“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和话语界，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所用的仍然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而不是什么“人性为本”的基准。

本书“清华园里血斑斑”一章中，一开头举的就是罗征启老师的例子。书中记录了罗征启老师遭到两次残酷的人身迫害的经过，一次在1966年的824事件中，一次在1968年的武斗期间。这两次迫害的手段都是极为残暴，令人发指。对清华文革历史略有了解的人们知道，824的恐怖事件不是蒯大富干的，而是一些拥护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刘少奇工作组的高干子弟干的。对罗老师进行第二次迫害的清华武斗，现在的主流史学界基本持否定态度，其施暴的凶手，也已经基本得到惩戒。罗老师对在这次迫害中对他的弟弟之死负有责任的孙耘同学表示宽恕，受到大家的交口赞扬。但是，对罗老师进行第一次迫害的824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主流的历史学家对它表过态，其组织者和施暴的凶手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其中有的人还官运亨通，身居高位。不要说罗老师没有机会对这个事件的责任者表示宽恕，他们中有人甚至在文革后对罗老师又进行第三次的迫害，他们至今对罗老师却是毫无宽恕之意。我们这些老百姓用“人性为本”的基准来评论，可能认为这样处理既不应该，也不公正。但是主流学界用的是“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他们就认为很应该，也很公正。因为他们看来，824的红色恐怖是保护刘少奇，政治目的完全正确。既然是你毛泽东提出来要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么把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小当权派抛出来痛打，这个历史责任就应该算在毛泽东的账上。当时痛打像罗老师这样中下层党员干部，是政治策略的需要，这样做的人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在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下，他们的理由确实也很充分。

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破四旧”、打砸抢，打出人命，现在春风得意的人，为数还少吗？民愤最大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始作俑者，老百姓想得到他在文革后当了多大官吗？所以说，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复原文革中的历史事实，并不这么简单。要复原文革中的恶性历史事件，顺着主流学界的声势，批批清华百日武斗中的残暴行为，那是远远不够的。

我决不是说，清华百日武斗这样的文革恶性事件不该揭露、不该反思。相反，我深深感到，现在揭露得还太不全面，反思得还太肤浅。不过，我对揭露和反思文革这件事，同主流学界的想法略有不同。他们揭露也好，反思也好，主要目的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我的目的，主要是想从中找出文化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校的清华学生，文革初期我也曾经狂热地拥护过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当然，我们理解的是正面宣传的理论，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实存在许多不公正的现象，确实有一些党内的当权派仗势欺压老百姓；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揭露他们，监督他们，是完全应该的。今天有的同学还记得，我当时曾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生逢时，死无怨。少年立志，赤化乾坤，誓将碧血荐。”但是很快，我失望地看到，那些高呼文革口号的红卫兵，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做尽人间坏事。我感慨万千地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绕口令似的感言：“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清除的东西，拿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左右文化大革命，是一定会断送文化大革命的”。

我对蒯大富他们这样的平民造反派曾一度抱有好感，对他们某些观点也并不十分排斥。但很快我又发现，他们得势之后，整起人来也是灭绝人性，同以前压迫他们的那些高干子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对文革理论产生怀疑，从消极抵制，逐渐发展到坚决反对。我对团、四两派的极端理论都深感厌倦，长时间中整天沉浸在书籍堆里，试图从马列原著和西方资产阶

级启蒙运动的思想中寻找答案。在清华武斗中，我这个文弱书生，竟以一个普通士卒的身份，留在学校同蒯大富的团派势力作殊死抗争。530以后，形势变得十分严峻，留在学校里的人都有一种随时面临死亡的感觉。我曾向汲鹏提出过一个要求：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死了，这是我自愿的，只是要求，千万不要在悼词中说我是保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而死的红卫兵或者烈士之类的话。那时，我最反感的就是这种话。

文革中，我同广大民众一样，对“四人帮”和造反派最痛恨、最反感的，是他们那些丧尽天良的整人手段，也就是说，我们是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来反对他们的。在武斗中，眼睁睁地看到身边同学一个个的死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在堂堂中国首都，为什么会这样没有王法？这样公然杀人放火的事情，最高领导为什么不出面喝令制止？这种徒呼奈何的愤懑之情，郁结于心，至今未能消散。

“四人帮”对立面的政治力量，开始时也曾发动人民群众以“人性为本”的基准打倒他们。但是，这种政治力量取胜之后，很快收起“人性为本”的基准，在不知不觉中换上了以“政治利益为本”的基准。蒯大富领导的武斗打死这么多人，后来把他判刑关牢的主要罪行并不及此，而是“投靠四人帮，打倒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文革以后，当时群众揭发出来的干部腐败行为的种种事实，统统成了造反派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不实之词，一风吹掉。经过文革的风浪重新掌权的党内当权派，将人民运用民主监督的权利，视为文革余毒，理所当然地给予取缔和打击。正因为这样，现在，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成了中国政界的痼疾。人民群众的不满之声，不绝于耳。

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现实，促使我对文革在经过反思以后，又进行了再次的反思：现在被批得臭不可闻的文革理论，是不是也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合理的内核呢？记得文革初起时，美国记者找到当时居住香港的张国焘进行采访。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主要是追求他心中的社会平等。作为毛泽东长年的同志和政敌，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种理解，对我们今天追索文革历史教训，有着特殊的意义。连张国焘都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部分是为了他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平等诉求，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是，任何理想，如果只有凭借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才能实现的话，这种理想本身也是邪恶而不可取的。

这里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社会平等的理想和违反人性的残暴手段，这两者之间，难道就必定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割的吗？

现在的文革研究者，对一度掌权的造反派往往抱有成见，认为他们都是些贪污腐化的痞子。事实不完全如此，有些掌了权的造反派，在经济上，与改革开放后的许多当权派相比，实在是要清廉得很多。据我所知，即使在清华武斗这样的混乱情势下，负责学生助学金发放的团派人士，一直忠于职守，账目清楚，做到了一钱不沾。掌管团派“井冈山报”收入财务的人员，也真正做到廉洁奉公。工宣队进校后，对他的账目进行审计核查时发现，一份份井冈山报所卖的收入，全然入账无误，所差的几万人民币，乃是经蒯大富批准，用于资助武斗中负伤残疾的同学。最后，在工宣队的监视下，这个团派人士到负伤同学的家里取回这笔差额现款，他流着眼泪却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放在这个困难同学的家里。

我们不能因为文革中追求的某种理想，而原谅、容忍、甚至肯定那些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同样，我也不认为，由于充满了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文革中所提倡的一切东西就必定都是错误的了。难道，为了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中所极力反对的党政干部特权、贫富两极分化、道德败坏和贪污腐化等等社会丑恶现象，就能统统变成合理、合法了吗？

我在再反思中还是坚持认为，文革中那些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毫无疑问，是百分之百完全错误的。正是这些百分之百错误的、灭绝人性的理论和做法，使文革丧尽了民心，遭到人民的唾弃。而我耽心的是，人民群众这种唾弃，在某些政治利益阶层的导引下，连将文革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那点合理内核，也一并全部唾弃掉了。

~~~~~

## 【研究动态】

### 《倒下的英才》作者序

• 唐金鹤 •

《倒下的英才》这本书分为上、下两大部分：上部记录了文化革命中清华园内的点点滴滴；下部则是我自己在清华百日武斗中的亲身经历。这是一本集体的回忆，我只是被大家推到前台的第一执笔者。

这是一段40年前的历史。我们写这本书，是试图为这段历史提供一些真实的场景与细节。历史不是靠想象得出来的。没有历史的场景与细节，就没有历史的实感。而没有实感的历史，就只剩下了一些概念与口号。如果只根据这些概念与口号，那就无从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更谈不到反思。

这里记录下来的是清华园里一些人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很多人都向我们表示，不要再提那一段时间，忘记它。他们说：本来已经结疤的伤口，为什么要揭开，让伤口再滴血呢？揭开这些伤疤我们也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只希望告诉后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园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未必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但记录下来就是对历史的补充或注释，是对历史和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那些不幸丧生的人们负责。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考虑到多种因素，文中一些人的名字被隐去了，但这不影响文章的真实性。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证本书描述的数据属实。书中所涉及的事件，或由当事人本人执笔；或经过当事人的审阅与认可；或在多个当事人之间，互相印证、互相切磋、去伪存真。

清华园太大了。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每个事件发生的环境与其来龙去脉，文中配合叙述，提供了相关的1968年的清华大学校园计算机复原立体图。这些立体图是由建九班（1969年毕业）的肖春涛学友，根据1986年的清华大学平面图修改，绘制而成的。画家温毅明先生为本书作画。

清华的百日武斗已经过去40多年了。当年使两派同学慷慨激昂、以致执戈相向的派性情绪早已烟消云散了。现在，经常可以见到当年的两派同学坐在一起，谈古论今；真可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但在本文的叙述中，当年的派性的口号、派性的语言俯拾皆是。清华园里短短的这段历史，就是两派相争的历史。回避当时的派性，删除派性的语言，就无法真实地再现当时的那段历史。在这本书中，我们绝对不想抬高某一派，或贬低某一派。现在我们认为清华的两派，老团和老四，是一对同根的兄弟，他们都是那个疯狂时代的受害者。

有人提出：我们现在回顾历史，就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不带派性、客观地、没

有感情色彩地来叙述当时的历史。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们也尽力屏除派性，尽量客观地展现那段历史。但是我们觉得，只有上帝才能够完全做得到这点。上帝高高在上，俯视人间，只有他才能够不偏不倚地评说人间万事百态。而我们是一介凡人，又是亲历者，我们的叙述，难免带有当时的立场、观点，难免流露当时的情绪、感情。我们这样写只是为了再现历史。

《倒下的英才》从初稿到如今，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有一些部分前后改写十几次，不觉间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百日武斗时一个个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在我面前映现。特别是许恭生、朱玉生、孙华栋……这些本来可以成长起来的英才，却一个个无辜地倒下了；他们的影像，在我的脑中越刻越深。别人是在笔尖上沾上了墨水来写字，而我，经常在心里浸满着悲伤的泪水，在心里流淌着痛苦的鲜血；我是在泪水和血水中，写下了这里的一个个文字。这四年的时间对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多少次我想放弃，我想停笔，不干了。但是我周围的一帮学友，他们总是在激励我，监督我，要我咬紧牙关写下去。我们希望，这段历史不因我们这些亲历者老去而被湮没，也不因我们这些亲历者的沉默而被扭曲。我们的同学陆小宝说过，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后的责任”；我们记录下清华文革中的这段历史，是为了思考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教训。

在本书最后的“反思”中，我们谈了一些认识。这些认识太粗浅了，我们抛出来的连砖头都不是，只能叫抛‘泥坯’引玉吧。

为了纪念当年清华园内不幸丧生的人们，我将这本书命名为《倒下的英才》。

愿清华园里那些倒下的英才们安息吧！

2009年仲夏于香港

□ 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11月初版。

~~~~~

【史实辨析】

科学馆的十天——我被414囚禁的日子
——兼读唐金鹤《倒下的英才》有感

• 陈育延 •

1968年5月19日，正值星期天，我一早准备回家洗澡、换衣服。由于前一晚开总部会听到了蒯大富宣布的有关一教前哨广播台打死孙华栋的事件，心里非常不舒服。当时，总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已是19日清晨，蒯大富说：“有一件事情向大家通报一下，就是一教广播台前几天抓了代表队的的一个414，审问的时候可能下手过重，大概有些内出血，他要求喝水，当时在场的人不太懂，就给他喝了水，结果一下子呼吸就困难了。后来×××他们几个人赶紧送他去医院，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送去的人也吓坏了，就没敢留真姓名离开了医院。”此话一出，我的脑袋立刻就大了，感觉就像现在听到谈论肇事逃逸一样。本来我就不同意两派搞得你死我活。一向主张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可以辩论，一派消灭另一派也是不可能的。现在出来这种人命案，处理也不得当，因此对现在的运动产生了失望和灰心。我对叶志江说：“我都不想干了，这哪里象是干革命。”结果还没考虑好如何退出运动，就被414抓进了科学馆。

19日上午11：00左右，叶志江骑车，我走路，平常每天背的军用小书包里放着我的工作笔记本，书包放在叶志江的自行车行李架上。路过科学馆时，有人从上面扔石头挑衅。我随便骂了两句，完全没当回事，继续走我的路。这时突然从科学馆里冲出几个拿长矛的414

学生，我一看有危险，赶紧叫叶志江骑车先走，不想让笔记本落在4 1 4手中，因为上面有总部会议记录和武斗部署。虽然我在团派不得势，但我赞成团派的观点，又是总部委员，不想自己这一派组织的秘密泄露给对方。叶志江懂得我的意思，骑车走掉了。我落入了4 1 4手中，在科学馆的暗室里住了十天，到5月28日被抬出。

我后来听人讲过当天的两件事：一是叶志江跑到离科学馆最近的团派一教前哨广播台，告诉他们我被4 1 4抓了。一教当时就有人问他：那你怎么跑出来了？也许这给叶志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三天后，他也进了科学馆，要求换我出去。二是4 1 4本来准备抓我进去教训一下，没想扣留我。因为知道我是鸽派。但很快，一教广播台就发出了抗议：“抗议4 1 4反革命集团扣押我团派总部委员陈育延……”科学馆的4 1 4干脆就不作二不休，扣住我不放了。

在科学馆，我住的是“单间”，一个大约4平方米的小房间，很黑，没有窗户，据说是原科学馆洗照片的暗室。这个房间有一半是一张操作台，那就是我的床，只要一出这间屋子，例如上厕所等，就要被蒙上眼睛，所以我至今不知道我到底住的是哪间房。

进去的头两天，没有人审问我。我只知道团派广播台天天在抗议，以我为文章，攻击4 1 4。当时我想不明白：4 1 4为什么要抓我，他们明明知道我是鸽派，不掌权。团派在武斗期间全是鹰派掌权，我对他们不会有太大价值的。干嘛还要费这个神？三天后，5月22日，我被带去审问，蒙着眼睛坐在一张没有靠背的独凳上。审问的人很凶，要我交待这个，交待那个，特别问到了孙华栋的事情。我虽然因为此事对蒯大富，对团派不满，但认为这是自己这派组织的秘密，是绝不能泄露给对方的，因此一口咬定不知道。这时候有人就用一种很宽很重的类似汽车轮胎胶条一样的东西朝我头顶上抡来，一下子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我只好咬紧了牙关。在这种气氛中，自然无法正常进行对话，直到最后一抡差点把我从椅子上抡倒到地下，他们才结束。回到我的小暗室里，我就开始恶心，想吐，不能进食。第二天，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老毛病就复发了，胃痛，更不能进食。三天后，我已经可以进食了，但是我想，我已经三天未进食了，干脆就绝食吧，4 1 4总不至于看我饿死在科学馆里吧！这是我唯一能出去的方法。因此关到第九天，我已经虚弱得不行了。5月27日晚，他们将我这个六天未进食的俘虏背出了科学馆，放在一辆板车上，蒙上被子，嘱咐我不要乱动，不然团派乱开枪打中了，大家都说不清楚，趁着天黑离开了科学馆直奔主楼。

第二天上午，通知我母亲来接我出去。那时，我母亲在北京邮票厂当党委副书记，是当权的一派拥护的干部，所以还能叫到厂里的小轿车。同时来的，还有我15岁的大弟弟陈育平，为防突发事件厂里一个干部也陪着来了，加上司机共4个人，开车来接我。我弟弟和4 1 4一个女同学轮流将我背出了清华。我那时的体重大约不会超过70斤，所以15岁的弟弟也能背着我跑。回到中联部，我就给蒯大富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出来了。当晚，蒯大富、陈继芳就开了个吉普车来我家接我，怕我再次被4 1 4抓走。这时候，我才知道叶志江也进了科学馆，因此心里很难过，也很感动。

那一晚，中联部里热闹非凡，我家门口拥挤不堪。因为蒯大富进门时，在门口警卫处报了他的大名，因此中联部的人，特别是孩子们，都来我家看蒯大富真人。接我走的时候，蒯大富是从人堆中挤出去的。据说经过人群时，各种恶作剧都有，有人揪他的衣服，有人掐他的胳膊，吉普车的轮胎也被放了气，只好换了轮胎才走成。

到了清华，我就开始吊盐水，吊葡萄糖。那时年轻，身体素质好，恢复得很快。叶志江的妹妹叶志锡也到清华来住，一方面照顾我，一方面打听他哥哥的消息。我弟弟也常来清华，给我送些吃的和换洗衣服。我在静斋三楼，整整休养了两个月，一直到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校。

因为静斋是团派总部所在地，蒯大富他们住在二楼，总部在二楼办公、开会。我因病住三楼，基本上不参加会议。但住在这里很安全，不担心再被414抓走。由于不参加总部会，也不必再争论什么观点。在被414关押的十天中，没有泄露团派的重要信息，因此鹰派也不再排斥我，就这样平静地住到了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校。7月27日当天，我一整天都在静斋，看到了7·27当天发生在静斋的全部事情。虽然我不是了解当天情况最全面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讲的都是最真实的事情，因为我是亲历者，而且保留有当时的日记，会议记录和随后的“交待材料”。

在武斗中，双方殴打俘虏是很平常的事，毕竟谁都不是正规的共产党部队，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掩饰这个现象。我在以后的日子中，也从来没有打听审问和殴打我的人。毕竟那是在混乱的运动中。我相信，在科学馆里那些挨打的人中，我应当是“受刑”最轻的，一则我是女的，那么瘦小。二则我与414中很多人都有着老八八的千丝万缕的情结，他们手下留情。但对叶志江就不会太客气了。几个月后，在工宣队组织的两派头头参加的大联委学习班上，我与414科学馆的“监狱长”王永县同分在一个小班中。他是68年5月16号当上科学馆的卫戍司令的，三天后，我被抓进了科学馆。在学习班上，王永县曾问我：抓我进科学馆时，知不知道孙华栋被打死的事，我说知道，他很生气，因为我当时没有供出。但他很真诚地对我说：“叶志江不错，打得挺厉害，一点儿都不屈服。”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叶志江在科学馆，是挨打比较重的，根据叶志江的叙述，还有一个挨打比较凶的，应当是“金戈铁马”战斗组的杨立人，也就是叶志江所说的那个“娘娘腔”的铁杆团派。他是电机系的学生。

以上这一段文字，是我正在写的回忆录中的一小节，其实早已写好，本想跟我的全书一起发表。但看了今年唐金鹤的书《倒下的英才》，其中“关于老四打人”一段（第109页），觉得实在有点可笑，因此特将我这段文字摘出来贴在校园网上。

对此，我只想讲三段话：

第一、唐金鹤虽不敢否认科学馆打人之事，但总想含糊糊一带而过。因此她质疑叶志江的“七次毒打”，找了几个“没看见”的旁证。我以很平静的态度告诉大家：武斗中双方打俘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谁都不会手软。只有怕对方报复太凶，才会手下留情。各方完全不必替自己掩饰，否则历史将没有真实可言。在当时大讲“阶级斗争”，“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政治形势下，青年学生的过激行为是普遍发生的，包括在“战场”上或在各自“监牢”的关押中。打人者应当自责，虽然鉴于形势他们并不应负主要责任。而被打者可以宽恕那些因政治激情而作出过激行为的青年学生。但不应宽恕的，是那些专门以打人为刺激的专业打手和至今不想为自己的过激行为道歉的回避事实的人。

仅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例，当时我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女学生，身材瘦小，手无缚鸡之力。虽是团派总部委员，但我是温和派、鸽派，从未抓过、打过、审问过414派人员，在团派中也受到过排挤，这是清华两派头头们皆知的。但即便如此，在科学馆中，对我这样的女俘虏，尚且不会放过，下得去手打。更何况是对那些拥护团派的“走资派”（例如陶森等），及态度强硬或观点很“团”的男俘虏（例如叶志江、杨立人等）怎么可能不狠打？就连414派的头头（如王永县等）自己也曾承认过。我相信叶志江讲的科学馆的七次毒打基本上是事实。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必要羞羞答答加以掩饰。我将来写出的回忆录，也一定会遵循这个原则的。我也希望真正想写点真实历史的学友们，不要回避四十年前的真实经历。掩盖或歪曲事实的结果是必然会挑起派性的。当然，有些派性是可以理解的，例如沈如槐在《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派性，是他作为当事人在回顾历史时的真实感受，他的出发点是写历史。又如孙维藩和邱心伟的书《清华文革亲历》也会有或多或少的派性，但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尽量真实

地写历史，他们是负责任的。我相信将来我的回忆录，也会有派性，但我会尽量站得高些。我也会揭露自己派别中的错误、分歧和矛盾，但我不希望被人利用，作为派性斗争的武器。我赞赏李自茂，正大光明公开撰文叙述 5·30 战斗，回顾历史要有这样的勇气。如果有人以此作为攻击对方的口实，挑起派性争端。那么只会阻止两派活跃分子出来揭示自家内部的分歧和错误，它不利于我们对真实历史的探究。

第二、唐金鹤在“关于老四打人”一节中，特别强调了一点：是说叶志江在科学馆被抓后“不识时务”，竟敢与“审判官”辩论，因此“难免要受些皮肉之苦”。同时，她又举了一个周大卫的例子，说他就“特别识时务”，因此，“好像没有挨过打”。现在周大卫已经去世，至于他是否被抓过，是否“识时务”，是否“没挨过打”我们尚未考证。但仅就唐金鹤的观点：似乎“被打”的责任不在打人者，而在被打者“不识时务”。这是什么逻辑？这种没有自责的心态，如果放在四十年前，也就罢了，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居然还会如此，甚是令人惊愕。

第三、唐金鹤说周大卫“趴在地上，哇哇大哭”，且不讨论这件事的真实性，单就这种故意丑化对方的手法，就使我厌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在支配着她？她的意图到底是想表达什么？至少不是在堂堂正正地叙述清华历史。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运动，在文革中各方俘虏在暴力威胁下，可能有软弱的表现，但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他们的污点。宣扬这些只能证明宣扬者的心理阴暗。而唐金鹤写所谓的“周大卫事件”到底是什么用意，是不是还想再来一次各派揭老底大派仗？这是历史的倒退。如果她是在杜撰或捕风捉影那就更加恶劣了。

另外，唐金鹤对许恭生之死的描述，可以很明显地感到，她居然把责任推给了团派，在所谓的“忆恭生”中有一节题目叫“延误送医，失血过多而死”，胡扯什么许恭生是由于“延误送医”而死的。谁都知道许恭生是被刺了二十多矛而死的，腿动脉刺穿血流如注的速度，是等不到送医院的。不知道她这个工科大学生，什么时候开始改行作“医学鉴定”了。这个结论是来自测，还是来自派性？

对她书中众多的蹩脚之处，我也只谈这两例，其他就不一一赘述了，以免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看不到唐金鹤的“善良”和“以人性为本”的老祖母形象，倒更像个派性老祖母。而陆小宝对她的赞赏，一下子将我一直以来对陆小宝的欣赏击溃了。原来勤于研究历史的陆小宝，其实仍然固守着派性，而且是针对文革中各种派别的“多角派性”。除了延续在团派和 414 之间的派性之争，还想联合他所认为的“坏人较多”的团派“兄弟”去对付像谭立夫那样的“保守派”。其结果必然是延续了“群众斗群众”。

我不希望看到丑恶的派性再来破坏我们现在的友谊，撕开我们开始愈合的伤口。它不利于我们对真实历史的探究。其实，我一直努力作的，也正是想在有生之年平复历史给我们这些清华学子造成的裂痕。如果现在能以“大联合”的姿态共同回顾，才有可能写出最真实的、最全面的历史，那将会更有益于我们的后代。

2009 年 12 月 6 号
~~~~~

【人物传奇】

杨宪益传（节选二）

• 雷 音 •



## 1 0 1 . 回到了残破的家

1972年“五一”前夕，杨宪益坐着外文局《中国文学》党支部书记派来接他的汽车离开了半步桥看守所回到了他位于机关大院里的宿舍。这个“家”已经“人去房空”整整四年，杨宪益重新与它见面时，它显得满目疮痍。在英文自传中，杨宪益描写了“回家”的所见所感：他（支部书记）打开了我的房门——这房门仍被两条白色纸条封着。房间被封了四年，一切都是原样。唯一的不同是，他们把所有的家俱和书籍都堆放在一间屋子里，简直是一团糟。我一进屋，几只受惊的耗子从衣柜和书橱里窜了出来。很久以来，它们就把棉衣和地毯咬成小碎片，做成了舒服的窝。我突然回来使它们很愤怒。在监狱时，我已经两年没有收到家里送的换洗衣服，看起来就像个稻草人一样，衣衫褴褛，破败不堪。怪不得这些老鼠被我吓的四处乱窜。我留在家里的绝大部分衣服都被蛀虫和老鼠咬破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件勉强可以见得了人的夹克衫换上。壁炉架上，那瓶在我被捕之夜喝剩三分之一的白酒依然伫立着。旁边，那个顶部种着仙人掌的死人头盖骨也还在，仙人掌已经死了。我记得，在我进监狱之前，我在机关院子里拣到了这个头盖骨。为了消遣，我在里面种了一棵小仙人掌。仙人掌已经长到一英尺高了，因为长期缺水而死。它一定是为了寻找阳光和水苦苦挣扎了很久。它依然挺立着，当我用手触摸它时，它立刻化为了灰烬。（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9—250页，雷音译）

接着，杨宪益写到他在阔别四年之后第一次“自由外出”的观感：

我试着把屋子略微搞干净一点，天已渐渐黑下来，我决定出去吃晚饭。党支部书记给我留了点钱，所以我决定先上饭馆吃饭，然后去买些新衣服，使自己看起来像样一些。我拿起一顶帽子扣在头上以遮住我的光头，出门找饭馆。我记得苏联展览馆离的不远，那儿有个饭馆，供应便宜的半西式的饭菜，我去了那儿。我点了一份菜，有一小片牛肉，外加土豆片。只花了一块五角钱，还不到半美元。我还要了一瓶啤酒。在监狱时，我总是想望吃高级的美味佳肴，现在出了监狱，我反倒突然失去了胃口，没有食欲了。我正在吃饭时，一个青年男子走过来，坐在我的桌旁。他是一个维吾尔族人，来自中国的中亚省份新疆。他开始给我讲述他亲眼目睹的在内地的暴行，并诅咒中国共产党。我感到他对一个陌生人讲这些实在是太鲁莽了，我制止了他，给了他一些善意的建议，警告他公开讲话不要太随便。我还脱下帽子，给他看我的光头，告诉他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然后我向他告别，回了家。（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250，雷音译）

上述文字非常重要。它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民情，还清楚表达了杨宪益内心的变化。他再也不是那个“放言无忌”的杨宪益了！

## 1 0 2 . 劫后重逢

第二天，杨宪益去上班。同事们对他表示了欢迎，就像欢迎一个出差四年刚回来的同事。人们闭口不提“坐牢”二字，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这当然是在文革政治高压下中国人典型的处事方式。但是，此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9.13”事件以后——内心已经有了大变化，他们开始置疑“文革”了。杨宪益的“无罪释放”不仅使很多同事认识到逮捕他的荒谬，更有人进一步开始怀疑文革以来（甚至更长时间内）对他做的一切是否正确。因此，当领导上动员大家帮助杨宪益清扫房间时，不少同事都积极参加，似乎这样做可以减轻他们内心的歉意。杨宪益过去的小组长唐笙在回忆中谈到了她的感受：

我一直知道领导上对他（杨宪益）政治上不信任，所以跟他的关系一直就有些距离。……应该说我跟杨宪益戴乃迭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我也喜欢文学，我们俩的背景也一样，他是牛津我是剑桥；可是我那时候非常要求进步，这一要求进步就麻烦了，什么都得听领导的话，所以

总是跟我自己内心有很大的矛盾。我跟杨宪益的关系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好起来呢？他们两个人给抓起来关了四年，我觉得他们很委屈。可是我自己到了文化大革命后也不受信任了，成了被“招降纳叛”的头一个。到了那时，我就跟他一样，也变成挨打的了。跟他站在一块儿了。到他放出来的时候，领导上又说话了“你们去帮他收拾屋子”，因为觉得错了，做错了。我很高兴。杨宪益这个人态度非常好。我们去帮他，他已经坐了四年牢，还挺不好意思的“哎呀唐笙你怎么也来帮忙啊！你不要擦了，那么多人，你就别干了。”……从那以后，我跟杨宪益的关系就很好了。我就甩掉了好几个包袱，甩掉了组长的包袱。……可是（过去）作为他的行政领导，作为他的组长，我们的关系并不好。（唐笙访谈，1999年11月29日）

唐笙的话，代表了许多同事对杨宪益的认识过程。

出狱后，杨宪益到妹妹杨敏如家去看望母亲。徐燕若见到阔别四年的儿子，不禁老泪纵横，妹妹也陪着掉泪；杨宪益却“笑嘻嘻的”，尽量做出轻松的样子来安慰老母。他绝口不提在监狱里的事，“一切向前看”，似乎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但是，事情远非如此。杨宪益虽然是活着出狱了，但是他还留了个“尾巴”。四年的监狱，除了搞清他不是“英国间谍”以外，其他的“问题”一律照旧。“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三面红旗”等等帽子还戴在他头上；何况戴乃迭这个“英国人”永远也变不了“中国人”。只要戴乃迭的黄头发蓝眼睛变不成黑头发黑眼睛，戴乃迭就永远是“外人”，她的丈夫杨宪益也就永远不可能是“自己人”。这一点，连杨宪益的老母亲徐燕若心里都清楚。杨敏如在回忆中提到一件事：杨宪益戴乃迭被释放之前，公安部的“专案组”找家属谈话，特地向杨宪益的老母关照提防家中的“外国人”的问题：

专案组的人来跟我母亲说：“他们不久就没问题，就要出来了。不过老太太你懂不懂什么叫‘中外有别’呀？你儿媳妇是外国人，你就不能什么话都跟她说呀。”我母亲说“我懂我懂”。连我母亲都接受这个教训。（杨敏如访谈，1994年6月21日）

心有余悸的亲戚们下意识地与杨宪益“保持一定距离”。杨敏如谈到了一件事：由于害怕，她当时都“没敢”去帮助杨宪益收拾“堆积如山”的家具和满屋子的灰尘。

几天后，戴乃迭出狱。杨宪益遵照领导的吩咐，专门买了鲜花、巧克力迎接她。他还给自己买了香烟和中国白兰地，庆祝他们的出狱。关于他和戴乃迭久别重逢的细节，杨宪益在各种回忆中都没有详谈，倒是戴乃迭在一篇回忆中写道：

1972年5月，我知道宪益已经被释放，一周之后，两个同事来带我回家。宪益已经整理好了房间。在我的桌子上，我看到一瓶白兰地。我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宪益说：“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摘自李辉：《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大象出版社）

戴乃迭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三个孩子的下落。在妹妹杨敏如家，戴乃迭惊讶地得知，她和丈夫的被捕使她在中国的所有亲人都遭到了牵连和厄运。尽管戴乃迭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三十多年（从1940年算起），但她对“一人获罪，株连九族”的有中国特色的深厚传统仍然所知甚少。在她这个英格兰人的头脑里，怎么也想象不出她的被捕会使身为共产党员的大妹夫一家子也成了“准囚犯”，她七十多岁的婆母立即被罚每天去扫大街；更想不到她和宪益的入狱使她的孩子们顿时失去了任何生活来源，靠变卖家什过活（外文局在他们入狱的四年间没有给她的孩子一分钱生活费）。她十分相信监狱长向她保证过的话：她的孩子“有人照顾”，当她得知情况并非如此时，她哭了。她说要是在监狱中就知道这些，她肯定是活不下去的，她撑不到今

天。所幸的是，她了解到，孩子们虽然吃了苦，但还安然无恙。她和杨宪益还来得及用日后的努力来弥补过去“欠”孩子们的一切。

他们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出狱”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他们将要面临另一种苦难。而且，这苦难将伴随他们整个的后半生。

### 1 0 3 . 杨宪益的变化

从外表上看，狱中出来的杨宪益除了脸庞有些苍白虚胖以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朋友和同事却观察到，他变了。整整一千四百六十天身心失去自由的关押和每天24小时全天候的监视（更不用说逼供、恐吓和死亡的威胁），在他心里印下了深深的烙印。过去那个放言无忌毫不在乎的杨宪益不见了，他成了一个“顺从听话”的“良民”。细心的友人甚至注意到他的眼神、举止的变化。在杨宪益出狱第二天就去看他的邹霆描述了刚出狱的杨宪益给他的印象：

出来开门的杨宪益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还不是因为杨宪益在狱中被推光的“秃头”，而是他的脸色、皮肤和尚未恢复正常的眼神。这一年，杨宪益还只有57岁，但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是在铁窗大墙之内度过的，粗劣的囚粮牢饭以及不见阳光的日常生活，加之一度存在着“逼、供、信”以及死亡的威胁，对于妻儿的刻骨思念，使一个一向乐观、一贯以“老庄之道”的眼光看待事务的杨宪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晦气和霉气。（邹霆：《永远的求索》，32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身体出了监狱，但是精神仍然被禁锢，这就是当时杨宪益的状况。他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改变不了“囚徒”的习惯。他的同事熊振儒提起一件事，令人震惊和深思：

四年牢坐了以后，对他（杨宪益）影响很深很大的。杨宪益出来以后，一听到说“杨宪益”，他就“是”——蹦地就跳起来了。在牢里的那一套啊！就是管教人说“杨宪益”，他“是！”就站起来了，就发颤。监牢那一套有四年时间，习惯了那一套。一提杨宪益，跟他一说话，“蹦”就站起来了。就跟牢里犯人一样。我们看了以后很难受，一个老知识分子怎么这个样子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半年多才（恢复）过来。…那时，他人好像有种发呆的样子。坐牢时间长，有点发呆了。（熊振儒访谈，1999年12月26日）

其实，杨宪益的变化，不自坐牢起。自从1966年7月他被“揪”出来以后；自从他被“揭发”有“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言论”和其他“三反言行”，被打成“牛鬼蛇神”后，他就开始变了。读者当还记得，这个过去从不言怕的人在自传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在“红八月”里他“真的害怕”了。他怕什么？笔者在前面分析过，他是害怕“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害怕成为“革命熔炉的弃儿”。正因为他当时认可文化大革命，拥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内心深处会有撕裂，会有大的矛盾冲突，他才会一度精神分裂。后来，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修养和他幽默达观的性格帮他渡过了精神危机。然而，此时的杨宪益已经变了，他渐渐地习惯了他的“新身份”：作为一个“牛鬼蛇神”，他成了一个“非人”；每一个“革命造反派”都可以命令他，侮辱他，对他呼来喝去。

1968年4月下旬，他被“当众逮捕”，进一步标志着他已被公开“清除”出“群众队伍”；随之四年的牢狱之灾，他面临随时会被“拖出去枪毙”的命运，他的生命早已毫无尊严可言。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

上头的人告诉看守：所有这些犯人都是地球上的渣滓；看守们对我们极度蔑视，好像我们都是些低等动物。（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1页）

毫不奇怪，杨宪益从这样的境地猛然重新回到“人间”，一下子会改变不了囚徒的习惯。然而，难以改变的，不仅是囚徒的习惯，更是囚徒的心理。

杨宪益在口述历史时，曾经提到他蹲过的监狱。那座楼被称为“八卦楼”（也有犯人称它“八角楼”、“王八楼”），这座楼酷似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全景敞视圆形监狱”：

陶然亭白纸坊旁边的监狱从前叫第一模范监狱。很坚固。里面有一个八角楼。说是八个角的。特别建筑的一个楼。楼里头分着很多牢房。八角楼中间有个楼梯可以上到顶上，可以站在上面放哨。如果有犯人逃跑的话，上面可以用机关枪扫射。是防备非常之牢固的一个地方。（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这种极为严厉的囚禁和监视，不仅禁锢了人的身体，也囚禁了人的心灵。正如福柯所说，在这样的居高临下无所不在的“监视目光”的压力下，久而久之，“每一个同志都变成了监视者”。再进一步，每一个人都会逐渐地自觉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狱卒”，实行“自我监禁”。这种自我监禁正是权力统治的“最高级表现”。

杨宪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这样的“自我监禁”的状况下。这是杨宪益最大的变化。

“圆形敞视监狱”是英国思想家边沁（1748—1832）在18世纪末发明的。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各国，不仅所有的监狱改造计划都以“圆形监狱”为蓝图，而且，这种圆形监狱的概念后来广泛推广到了学校、兵营、医院和工厂，统治者建立了人事档案，建立了奖惩制度，监禁逐渐趋于普遍化和日常化。因此，福柯称它的发明者边沁为“警察社会的猎犬”，把他的发明称为“人类心灵史的重大事件”。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每一个同志都变成监视者”的最极端、最疯狂的时期。杨宪益在这个时期的心理变化和他的“自我监禁”，可以在他的英文《自传》中找到例子。当时，林彪虽然倒台了，但江青和党羽依然大权在握。他们发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黑画、批邓等一系列运动。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杨宪益再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他对这一切抱“冷眼旁观、玩世不恭”的态度；甚至还参加了批邓的“大游行”：

江青倒台以前，她和党羽发起了批邓运动。他们要求所有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上街举行反邓示威游行。他们要我也去。我没有拒绝。那个时候我早已变得相当虚伪，不再发表任何不受欢迎的评论了。那次的所谓“群众游行”完全是一场惨败。街上的群众明显地没有任何热情，文化革命初期的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已经消失殆尽了。

江青还策划举行了一个黑画展，批判某些中国画家的画。她认为这些作品颓废和反共。一个老画家画了一个太阳，太阳的颜色有点粉红，被认为是攻击了毛主席。另一个青年画家黄永玉——我五十年代就熟识的朋友，我们翻译民间长诗《阿诗玛》时他为该书画了几幅美丽的插图——画了一幅猫头鹰，猫头鹰的一只眼睛是闭着的。这被指控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偏见，因此也是反共的。每个像我这样的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去参观“黑画展”，接受“再教育”。……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但我还是很顺从地去看了画展。我已经学乖了，知道任何异议都是毫无用处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54页，雷音译）

2001年11月，文革中曾参加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梁效”的北大教授周一良逝世以

后，他的儿子写文章追忆父亲的一生，沉痛地揭露了一个基本事实：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要想在中国大陆坚持独立人格是“无异求死”，这真是一语中的！

其实，聪明的人很早就看破了这一点。先知先觉如储安平者更是早在1949年以前就预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自由”是个多与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将是有和无的问题。几十年来，“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各种各样的“反动知识分子们”都以他们的命运一而再、再而三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说真话”是最稀有的社会现象。一般人说起话来总是“唯上唯官”，就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关键时刻不能说真话”；而杨宪益在过去却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显得十分愚钝。

可如今，“不谙世事”的杨宪益也终于在“批斗、监狱、死刑的威胁和无处不在的监视”的“威力”下明白了这一点。他也开始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了。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